

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

耿海英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要:洛特曼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状况,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中,中国学者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俄罗斯本土研究状况以及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关键词:洛特曼;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接受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5)06-0049-05

尤·洛特曼(Ю. Лотман, 1922 - 1993)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文艺学家、文化学家和符号学家。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以其为中心形成了苏联的“塔尔图学派”结构主义诗学和文艺符号学,七八十年代他开始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运用于更广泛的符号系统研究,形成其文化符号学。生前及去世后,他在苏联和世界符号学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洛特曼的学术活动开始有影响的时候,正是中苏两国交恶而中国国内意识形态日趋紧张的时期,洛特曼符号学自然不会得到正面介绍。对洛特曼符号学的介绍和研究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正值我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理论思潮,包括西方符号学理论怀有最初热情的时候。90 年代中期以后,洛特曼开始在中国符号学界、苏联文论界备受注目。但相比西方符号学,对洛特曼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也许是因为洛特曼的苏联学者身份,既有的介绍和研究,也未能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一篇名为《中国符号学研究 20 年》的文章,便仅关注索绪尔、巴特、皮尔斯、埃柯等西方理论家,对于洛特曼符号学压根未予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洛特曼符号学在我国的接受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为初步译介阶段;90 年代中期以后至今(本文材料选取至 2004 年底)为深入研究阶段,并从文艺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以及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初步的译介

1985 年在我国文艺理论界被称为“方法热年”。

伴随着对西方文艺理论和方法的热情,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符号学也来到了中国。1986 年 4 月出版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在第七章中谈到,60 年代以后符号学在苏联批评中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对符号学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为形式主义翻案;苏联学者开始重视其意义,但并不夸大这种意义,认为作品思想内容更为重要。这仍然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却是我国较早对洛特曼符号学的介绍。翌年 3 月,《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收录了吴元迈的《苏联文艺学的历史功能研究和结构符号探讨》。文章指出,差不多与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兴起同时,苏联文艺学界就结构分析、符号分析等问题也做了广泛探讨,而且,这种探讨具有他们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层面和内容。在这种正面的评价之后,作者就符号学在苏联于 60 年代重新兴起的状况及洛特曼的理论思想作了长篇论述,并就符号学在苏联引起的论争作了分析。这是我国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理论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同年出版的《外国方法纵览》一书,则在最后一章以专节介绍“洛特曼与苏联符号学”。作者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苏联符号学一脉相承。苏联符号学产生的社会氛围和成长的学术土壤,是苏联整个文化领域在五十年代末期的“解冻”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新方法开始引进。作者依据洛特曼的两部重要著作《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 年)和《诗歌文本分析》(1972 年),具体介绍了他的符号学理论,并把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符号学与捷克结构主义批评、法国巴尔特的符号学批评、德国卡西尔和美国苏珊·朗格的符号学放在同等重

收稿日期:2005-05-19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江苏邳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

要的地位加以评介,同时还涉及了60年代苏联的“结构—符号学文艺学问题的论争”。

1988年,《外国文学报道》第1期在“当代文论”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有关洛特曼的文章,其中一篇评介:《文艺结构符号的探索者——尤·米·洛特曼及其文艺学思想》,四篇译文:《模式系统行列中的艺术课题提纲》《文本的类型学课题》《论艺术文本中“结尾”和“开端”的模式意义》《我们已经分手,但你的小影……结构分析》。这种规模的译介活动,已显出我国文论界对洛特曼开始重视。

80年代有两部在我国影响较大的西方文论译著,对我国接受和研究洛特曼起到了重要影响。一部是佛克马、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对洛特曼的理论作了全面的研究,并比较了其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不同;另一部是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作者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章中考察了洛特曼的两部重要著作《艺术原文的结构》和《诗原文之分析》,具体深入地论述了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理论。有意思的是,伊著在当时就有三种译本。

而在8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胡经之、张首映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则收录了洛特曼的重要著作《艺术文本的结构》。不过,编者并未把它放到符号学一编,而是放到了结构主义一编。由此可见我国在接受洛特曼的初期对其理论属性的定位。换言之,中国学者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理论。而同年出版的董学文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在“语言与符号学美学论”一章中指出苏联有一批学者均就符号学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如爱森斯坦、普洛普、博加得列夫、巴赫金、弗列依登贝格、伊凡诺夫、波利亚科夫、赫拉普钦科等,以此阐明洛特曼符号学理论在苏联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丰厚的学术土壤。凌继尧两部著作《苏联当代美学》(1986)和《美学和文化学——记苏联著名的16位美学家》(1990)也都对洛特曼的理论给予了介绍。

1990年第4期《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一组叙述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徽周的文章《叙述学概述》从现代叙述的符号学角度提及洛特曼的符号学研究。而1991年第2期《苏联文学联刊》上发表的《苏联结构诗学》则全面介绍了苏联的结构诗学研究,其中洛特曼部分较为详细。

从现有资料看,这一时期我国学者从结构诗学、符号学、叙事学、美学、文化学等角度都关注到了洛特曼的理论研究,并给予了介绍,但还缺乏细部的、

全面深入的研究;从现在来看,对其理论的认识甚至是不全面的。当然,这与洛特曼的后期理论、思想还没有介绍到国内有关。不过,所有这一切既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良好空间。

二、深入的研究

1993年10月,尤·洛特曼逝世。1994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周启超的简述《“塔尔图学派”进入总结时期》,“总结”了这个学派的成就,并且敏锐地指出,“塔尔图学派”不仅在文学、文艺学、诗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向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扩展。显然,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这预示着我国对洛特曼的研究不仅在“文学符号学”上有所深入,而且在向其“文化符号学”扩展。

从总体上看,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对洛特曼的理论已经有了相当的重视。国家社科基金也两次为洛特曼理论研究立项。学界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其成果交叉出现,相得益彰,且持续不断,步步深入,从而形成对洛特曼理论的立体研究图景。

1. 文艺符号学。在洛特曼早期学术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结构主义诗学和文艺符号学理论。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1994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上刊发张冰的文章《尤·米·洛特曼和他的结构诗学》。这是作者在其前期《苏联结构诗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洛特曼所作的专门探讨。作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洛特曼结构诗学的理论基础和其理论创新,深入分析了洛特曼在诗歌语义学上引入的二分法——词形变化轴和句形变化轴,以及洛特曼运用其理论在诗歌研究方面的成就。

1995年第4期《文艺理论研究》刊登王坤翻译的洛特曼的《艺术文本的结构》第二章,并自定题目为“艺术文本的意义及其产生与确定”——这反映了译者对该文的理解,即洛特曼探讨的问题是:艺术文本的意义何在,怎样产生,怎样确定。作者认为,作为符号学家的洛特曼并不是不关心意义,相反,洛特曼认为“以研究符号为其动因的方法是不可能忽视意义的”,“正是符号和符号系统的概念才和意义问题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将这样一种符号学引入我国文论界,为我们寻求“意义”打开了又一个视界。该译文还简要介绍了洛特曼的生平,并提及了他的《结

这三种译本分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洛特曼及其艺术符号学研究”,张杰,南京师范大学,1997;“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的研究”,白春仁,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2001。

构主义诗学讲义》(1964)、《文化类型学论文集》(第一册,1970;第二册,1973)、《电影符号学和电影美学问题》(1973)、《诗歌文本分析·诗歌结构》(1972)等著作,为我国进一步研究洛特曼提供了一个线索。

1999年6月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述苏联文艺学的理论著作《苏联文艺学学派》出版。孙静云撰写“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专章。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对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理论、产生的哲学和历史渊源作了严谨而又深入的研究。这是我国洛特曼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洛特曼不仅是结构诗学理论研究者,而且具体研究文学文本。他选取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有价值的观点。对此我国学者也给予了重视。《试析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研究》、《结构与效果:艺术的复杂性与生活的本然性》和《叙事文本的“间离”:陌生化与生活化之间》三篇文章分别从洛特曼的形式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结合的文学研究新途径、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本文建构特征研究、叙事文本的“间离”效果等角度探讨了洛特曼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研究。2002年第1期《外语学刊》刊登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则提供了该学派产生的详细史料,并就它的研究方向和宗旨、主要学术思想、对俄语学乃至世界语言学产生的影响作以简述。另外,黑龙江教育厅资助的一个项目也是有关洛特曼文艺符号学研究的,《洛特曼的生活和创作》一文即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洛特曼生活和创作作了详细考察。

将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置于俄罗斯和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坐标系中加以研究的,有南京师范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研究》(2002)。作者在细读《结构诗学讲义》和《艺术文本的结构》等论著的基础上,对洛特曼理论内核进行了阐释和分析。这表明我国在基础研究层次上对洛特曼理论的关注。

随着对其文艺符号学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还注意到洛特曼关于文艺符号接受问题的思考。《符号学研究中的接受与认知问题》一文就是从作者/文本/读者间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文本的内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依赖关系以及文本接受的审美机制等方面探讨洛特曼的艺术符号接受美学理论。2004年第2期《当代语言学》发表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则在俄罗斯符号学的历史流变中,考察了洛特曼的语言符号学及文学文本理论,以及后洛特曼时期俄罗斯学界对其理论的研究。

2. 文化符号学。随着对洛特曼理论思想研究的不断加深,我国学者从90年代中期起开始关注到洛

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并展开了梳理与探讨。

《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发表的徐贲《尤里·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和曼纽埃尔·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研究了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作者认为,在洛特曼的电影符号学里,对社会和文化意义的兴趣远比结构分析浓厚,他的符号学加强了功能分析和文化批评二者间的联系,使得符号学研究从纯技术性的操作分析中解脱出来。文章运用洛特曼电影符号学的见解,深入分析了电影《蜘蛛女之吻》的社会文化行为符号意义。

1999年李幼蒸出版了《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其中“苏联文化符号学”一章涉及到洛特曼。2002年第2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李肃的文章《洛特曼文化符号学思想发展概述》,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给予了详细介绍,涉及了洛特曼的不少著作,如《论俄罗斯中世纪文本中的地理空间》(1965)、《基辅时期世俗文本中“荣誉—光荣”的对立》(1967)、《论文化机制中“羞耻”与“恐惧”的符号意义》(1970)、《普希金的长诗《安杰罗》的思想结构》(1973)、《思维世界》(1990)等,拓宽了对洛特曼的研究范围。2003年第1期《外语学刊》发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重点论述洛特曼晚期符号学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认为最能反映洛特曼晚期文化符号学理论的代表著作是《在意义世界里》(1990)、《文化与断裂》(1992)以及包含以上两部内容的《符号场》(2000),并就前两部著作的主要理论精髓,诸如“二元系统”与“非对称”、“符号场”、“对话机制”、“界限”、文化与断裂等问题进行了扼要阐述。2004年第3期《中国俄语教学》发表的《文化文本认知——洛特曼符号学中的文化与人工智能问题》则主要关注洛特曼符号研究中的文化与人工智能问题,具体着眼于他对文化与文本、智能类型和结构、思维结构、意识与智能、人脑结构与语言转换、元语言与文本认知等问题的研究,打开了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又一领域。

不过,总的来讲,我国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的接受与研究还处在初步梳理与探讨的阶段,即便是在当下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这一理论的价值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运用,对我国的文化研究也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至于借鉴其理论来解决我们文化研究中的问题,还有待继续努力。

3. 洛特曼符号学与相邻理论的关系。我们知道,洛特曼的早期理论主要是结构诗学,是在我国结构主义引进的大潮中被认识的,但洛特曼的理论兴起于法国的结构主义是否相同?是否是同一思想脉络?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何在?与法国结构主义的关系怎样?还有,洛特曼的理论思想与本国的形式

主义文论、巴赫金的诗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问题我国研究者也进行了思考。

黄玫的文章《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观》将洛特曼定位为“俄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并强调指出，这一“俄国结构主义”与“欧美结构主义”有根本不同，洛特曼诗学是建构在信息交际理论基础上的，正是这一研究视角使洛特曼的理论可能成为更具宽容性和兼容性的文化理论。张杰的《走向体系研究的艺术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理论探索》一文，则对塔尔图艺术符号学派与以鲍·安·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理论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区别，进而指出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在诗学探索与文化追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该文显示出我国对洛特曼的研究已经涉及其周边的学术语境。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再发表张杰的文章《符号学王国的构建：语言的超越与超越的语言——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探讨了构成苏联符号学的两根重要理论支柱“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和“洛特曼的结构文艺符号学”间的关系，对洛特曼及其“塔尔图符号学派”由结构文艺符号学向社会文化符号学的转向也给予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正是这一文化转向使得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更具理论活力，也使得该学派产生出丰厚的研究成果，如：乌斯宾斯基选集《历史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第1卷）、《语言与文化》（第2卷）、乌斯宾斯基的《俄罗斯文学语言史概要（11-19世纪）》、托波罗夫的《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神秘性和圣徒》、雅可夫列娃的《世界的俄罗斯语言图画片断（空间、时间和接受模式）》等。

另外，赵晓彬的文章《洛特曼与巴赫金》（《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也就两位大师的理论进行了对比。不过，比较视角是两者在世界观和符号学理论研究上的差别，探讨洛特曼符号学派对巴赫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洛特曼与巴赫金的相通性。文章指出“对话理论”也是洛特曼在研究中常常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洛特曼关于“对话”的阐释，表明了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对巴赫金对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4. 洛特曼的符号学在西方文论史上的意义。洛特曼的符号学在西方文论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1994年第6期《文学评论》上发表王一川的《从理性中心到语言中心》。作者指出，洛特曼等学者看到了20世纪诸种语言论诗学模式各自的局限，转而把语言问题放到更大的文化视界上作综合研究，建立文学的文化阐释模式。文化模式虽然仍以语言问题为

中心，但把语言问题视为更大和更为复杂的文化问题。这既表明了早期单纯倚重语言学模型的偏颇，又展示了走出语言学而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实际努力，标志着20世纪语言论诗学的进展。

另外，洛特曼的符号学在美学及艺术独立论的发展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王坤先后三次撰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意义：《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独立理论》（《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6期）和《西方现代美学的终结——塔尔图学派与洛特曼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均论述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发展史，指出，艺术从属论与艺术独立论，是西方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各自的主要标记之一，现代美学中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间的鸿沟即由此而来。而洛特曼提出的“美就是信息”，通过“外文本”和“文化链”的形式，将艺术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而既真正解决了艺术独立问题，又成功填平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之间的鸿沟。2003年作者又发表文章《现代中西方文艺理论学科基点研究》（《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学科基点的角度再次阐述了洛特曼以生物学理论和“外文本”概念为基石的“美就是信息”的理论是形成了成熟的独立型的文艺理论学科的基点，并以“文艺研究中的哥白尼”说法给予洛特曼以高度评价。

5. 洛特曼的符号学在俄罗斯本土状况。2000年周启超在《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塔尔图学派”备受青睐》。这是作者再一次对“塔尔图学派”在当代俄罗斯及国际学术界的状况给予关注。作者介绍了洛特曼逝世之后俄罗斯学术出版界和研究界对洛特曼理论遗产加以整理、总结的一系列工作，还就国际学术界对洛特曼研究状况作了介绍，显示了我国学者已经在我国、俄罗斯以及国际间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关注洛特曼研究。周的另一篇文章《“解构”与“建构”，“开放”与“恪守”》（《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则指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文论的建构是承继了50-60年代解冻时期始有的开放氛围。当时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讲稿》（1964）及巴赫金等人的著作面世，标志着苏联文艺学界开始从社会学反映论单一的框架中走出，进入多声部自由争鸣、多取向并存共生的新格局。而解体以来，在俄罗斯文论建设的结构性调整中，洛特曼学说也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

而吴晓都的文章《新俄国文论的走向概评——兼论文化诗学的基础构建》（《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2期）则指出，近年来，俄罗斯文论界的文化学研究十分盛行，对传统文艺理论的冲击非常明显。一方

面文艺学研究领域大量引进欧美当代新潮文艺理论,深入研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从俄罗斯民族文化中汲取理论养分,刻意突出俄罗斯文论经典大师的诗学观念及其对世界文艺理论和文化学的影响与贡献,其中就包括洛特曼。作者还特别指出,巴赫金“文化诗学”的诞生使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奠基人洛特曼的符号学上升到“文化诗学”的高度,而洛特曼超越结构主义的“结构诗学”对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文论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些都说明洛特曼及“塔尔图学派”的理论在其本土已经成为俄罗斯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

2003年3期《俄罗斯文艺》发表了王希悦、赵晓彬翻译的 . . . 加斯帕罗夫的文章《苏联60至90年代的结构主义诗学研究——关于洛特曼的诗歌文本的分析——书》,文中分析了洛特曼诗歌文本分析的四个有别于其它结构主义试验的显著特点。另外,2004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上有一篇塔尔马钦科与金元浦《关于‘俄罗斯当代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论研究’的对话》,其中也涉及了一些洛特曼的理论在俄罗斯本土状况。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对洛特曼在俄罗斯国内的影响与贡献获得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6. 我国学界对洛特曼理论资源的运用。孙静云是我国较早深入研究洛特曼理论的学者,早在1994年就运用洛特曼的诗学分析方法解读了高尔基小说《忏悔》的艺术本文结构,使得这部一直被认为是失败之作的作品以新的面目呈现,并确认了它在高尔基创作中的地位(《高尔基的小说〈忏悔〉艺术本文结构分析》《国外文学》1994年第2期)。之所以说作者是运用了洛特曼的诗学理论,是因为文中处处可见洛特曼的诗学分析框架。透过作者的分析可知,作者对于洛特曼的结构诗学娴熟于心、运用自如。

谭学纯、唐跃的文章《小说语言体验的五种》(《南方文坛》1995年第2期)从修辞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五个角度,描述了五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体验,其中从结构主义角度所作的描述主要是依据洛特曼对“模式系统行列中的艺术”的论述。还有班澜的《诗歌语言的张力建构》一文(《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9年第1期),运用洛特曼等人的理论探讨了诗歌之为诗歌的原因。

此外,我国学者在对加缪、普希金、布尔加科夫、布洛茨基等作家和和对雅各布森、海德格尔、巴赫金等理论家及翻译学、叙事学等领域的研究中,都有对

洛特曼理论的大量运用,充分显示了洛特曼理论对我国文学、文论研究的影响,也显示着我国对洛特曼理论的接受与研究达到的高度。

就在本文收尾之际,笔者又得到两部关于洛特曼符号学的专著,一部是2004年12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结构文艺符号学》(张杰、康澄著);一部是200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黄玫著)。前者是我国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近20年来的第一部专著,是两位作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洛特曼符号学理论进一步拓展、深化和系统研究的成果。该著全面论述了洛特曼符号学的方法论、理论渊源、核心问题(艺术语言、艺术文本结构、诗歌结构、《叶弗盖尼·奥涅金》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派、巴赫金及苏联文艺理论的关系等,可谓集我国洛特曼研究之大成,代表了现阶段研究的最新成果。后者则是作者进一步总结自己对洛特曼系统化研究的成果。从这些专著中可以看出,作为俄罗斯文论重要一支的洛特曼符号学理论对我国学者持续不断的吸引和我国学者对其孜孜不倦的兴趣与探索。还有一个可喜的消息是,2005年5月24—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了洛特曼符号学研讨会,尤洛特曼的儿子米洛特曼出席会议,并作了关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历史与前景和俄国文化中的“恐惧”之符号学分析报告。会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与爱沙尼亚洛特曼基金会商讨购买版权并翻译洛特曼全集事宜。这应该是我国进一步深入接受研究洛特曼符号学迈出的又一实质性一步。

从上述洛特曼在我国的接受与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出,除洛特曼理论著作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整体上还相当薄弱,已有的翻译质量也有待提高,特别是针对同一著作的翻译,译名与内容的翻译不同,以及某一著作的出版时间在不同学者那里的不同说法)外,在研究方面,对洛特曼文艺符号学研究较为透彻深入,对其文化符号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使我们对深入了解与研究洛特曼文化理论抱有更大的期待。

(编者注:本文原附有54种参考文献,均系国内介绍研究洛特曼符号学及其他理论的文章和著作篇目,由于篇幅有限,征得作者同意,除将部分出处显示在正文外,余皆删除,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 许力)

Acceptance and Study of Lotman's Semiotics in China

GENG Hai - ying

(Chinese Dept , Hua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62 , China)

Abstract : The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acceptance and study of Yuri Lotman's semiotics in China.

Key words : Yuri Lotman ; structural semiotics in culturology ; cultural semiotics ; acceptance and study